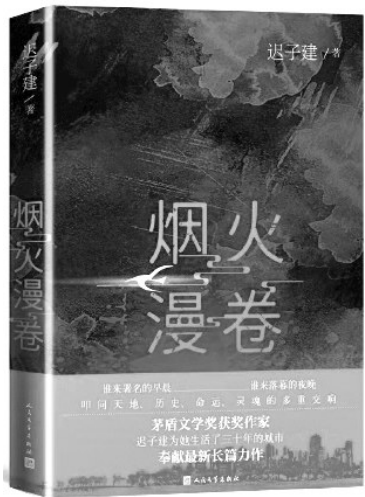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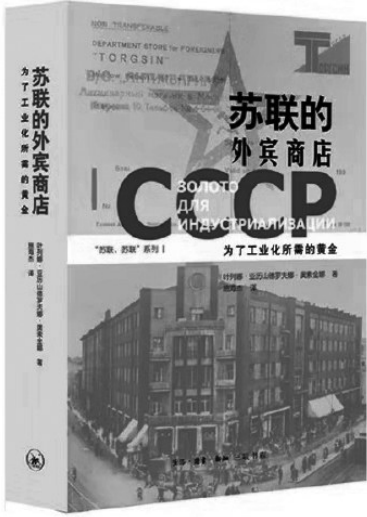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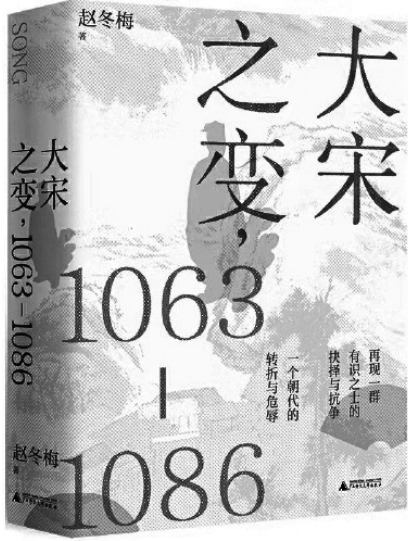


特别策划

在2020这不平凡的一年中,出版业经历了动荡与自救。回望出版业来之不易的成绩,我们会发现女性从业者始终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为年度书业生发明媚神采。2021年开年第一期,《新阅读》梳理了各大图书榜单上的女性主题图书,这次我们将目光转移到书榜上的女作家和书榜后的女编辑,并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与业界人士。

2020:“她智慧”让书业生发明媚神采

——年度书榜上的女作者与书榜后的女编辑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见习记者 黄婷

在2020这不平凡的一年中,出版业经历了动荡与自救。回望出版业来之不易的成绩,我们会发现女性从业者始终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为年度书业生发明媚神采。2021年开年第一期,《新阅读》梳理了各大图书榜单上的女性主题图书,这次我们将目光转移到书榜上的女作家和书榜后的女编辑,并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与业界人士。

当代世界女性写作的重要文化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女性主题的写作对女作家来说有先天的优势,能更好地共情与抒发情感,但如果因此遮蔽她们在女性题材之外的累累硕果,却有失偏颇。相反,在长期被男性主导的宏大叙事中,女性作者不仅努力发出她们的声音,也因为她们独特的视角,创作的作品屡屡为读者带来惊喜。由此,前篇已梳理的女作者的女性主题作品,本篇将不再赘述,而将着重女作者写的其他作品类型,并将其分为文学与人文社科两大类进行探讨。

——文学:生命体验与时代命运的彼此呼应

2020年榜单上女作家的文学类作品,既有她们对于个人生命体验的书写,也有对时代声音的聆听与时代命运的记录,两者的自然连接与融合,为读者呈现了一部部精彩纷呈的文学作品。这部分的代表是出现在多个书榜上的,迟子建的《烟火漫卷》和当代俄语世界著名诗人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记忆记忆》。

《烟火漫卷》是一部聚焦哈尔滨当下都市百姓生活的长篇小說。迟子建以从容洗练、细腻生动的笔触,燃起浓郁的人间烟火。小说中的人物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人物命运与城市历史互相交融,浑厚悠远。

《记忆记忆》是既有历史,也有哲学,更是文学的新类型复合小说。不仅有作者对于旧物、文献,以及试图“记忆”的人们——所作的文学和哲学的思辨,还有作者通过寻找家族遗迹,回溯俄罗斯近代史中的自我家族史,两部分共同勾勒出20世纪的诡谲风云与微小浪花。

书榜上的文学类女作家作品还有,波兰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融合了民间传说、童话、科幻、宗教故事等元素来观照波兰历史与人的生活《怪诞故事集》;携带着亚热带岭南独有的滋味、风景与记忆,讲述成长的歧途和可能的代价,林棹第一部长篇小说《流溪》;精选了写作富于思辨并且更具有雄性的中性气质,作为“二战”后美国诗歌代表性人物的乔丽·格雷厄姆的《众多未来:乔丽·格雷厄姆诗集》;本名杨云苏、原央视纪录片导演故园风雨前的散文集《巷里林泉》;旅日作家、资深媒体人库索的《纵身入山海》;美国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普利策文学奖得主安妮·普鲁,探讨人类与自然相处模式的多种可能性的《树民》;收录作家毛尖近20年来评述中国电视剧以及国外电视剧的88篇文章的《凛冬将至》;作家张悦然首部文学评论集《顿悟的时刻》;耶鲁大学教授的传记作品《寻找<局外人>:加缪与一部文学经典的命运》和90后爱尔兰女作家萨莉·鲁尼探索微妙的阶层关系,初恋的激情、脆弱与危机,家庭关系和友谊复杂的纠缠《正常人》等。

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红旗看来,2020年,各国女性在新冠疫情灾难下,不仅以博奕生死场的勇气智慧,诠释女性生命之爱的人类意义;而且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人文历史与生态写作方面,超越性别、民族、国家、宗教、哲学的差异性,开拓出一片温暖明亮、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共享时空”,为迎接“新全球化”的文化重建与人性重塑,提供了丰富鲜



活的“她文化”映照经验。

——人文社科:凝聚女性救赎的时代力量

人文社科历来是男性独占鳌头,但近些年来,该领域出现了更多女作家与女学者的身影。她们将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想,将丰厚的学识与刻苦的钻研化成一本一本流畅的通识读物,让读者享受阅读之乐,领略知识之美。如入选“中华读书报2020年度十大好书”等榜单的北京大学教授赵冬梅的《大宋之变:1063—1086》,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俄罗斯史教授叶列娜·亚历山大德罗夫斯卡娅的《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等。

《大宋之变:1063—1086》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一些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

外宾商店的盛衰历程展现了苏联应时而变得生动历史。《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不仅揭开了苏联国内史不为人知的一页,对外宾商店经营情况的分析也有助于就苏联的经济运作原则、日常生活特点和消费文化发展路径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榜单上女作者的人文社科类图书还有,哈佛政府学系第一个拿到终身教职的女性,也是美国政治科学学会首位女主席席迪丝·N.施莱克的法理学讲座成果的《不正义的多重面孔》;美国当代“归隐诗人”玛丽·奥利弗的《诗歌手册:诗歌阅读与创作指南》;在中国长大、从小浸淫于中国古典文化,著名的中国园林研究者玛吉·凯瑟克的《中国园林:历史、艺术和建筑》;赵妍杰讨论读书人看待家庭眼光

的转变的《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副教授涂炯的《癌症患者的疾病故事:基于一所肿瘤医院的现象学研究》;许卫红讲述史上没有记载的秦人生活场景《秦帝国崛起的秘密》,以及秦人绚烂文化的《考古有意思:秦始皇的兵与城》;英国著名自由插画师米莉·玛洛塔的《世界上最孤单的动物:43种濒危动物插画集》和乔阳写她在滇西北村子里生活时日日观察到的植物和动物,村里藏民日常生活的《在雪山和雪山之间》等。

王红旗认为,综观世界女性写作,小说、诗歌、散文、历史传记、研究专著异彩纷呈的实绩,集中表达出各国女作家女学者以不同语言与迥异叙事的风格,从人类社会面临的现实危机出发,以“重写”自我与家族、乡村与都市记忆的方式,对人与人、人与自然、战争与灾难历史的深度探索,从人类文明源头挖掘人的个体生命在历尽沧桑、创痛苦难之后,人性深处永存的爱与善的温暖,抵抗遗忘、反思历史,热爱自然、敬畏生命的灵魂底色。以象征隐喻、传奇与神话的多元审美意境,“和而不同”的人文关怀精神,凝聚成女性救赎的时代力量。这是当代世界女性写作的重要文化贡献。

女性出版人创造“最好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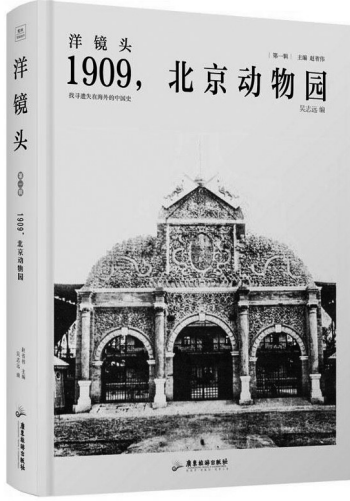
如果说榜单上的女作者是不容忽视的书业力量所在,那书榜后的女编辑们则在一定程度上算得上是背后的“功臣”。尤其是近年来女性主题图书明显增多,并受到读者的欢迎,这其中女性编辑功不可没。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久前由《出版人》杂志和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书业年度评选”结果中,十大“年度编辑”获得者中有6位女性编辑。她们分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部编审胡玉萍、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明琴工作室主任明琴、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中心主任李灿、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主任助理宋玲、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文学出版分社社长楼倩和福田文化传媒暖房子绘本馆高级编辑梁佳茜。

据悉,“年度编辑”是《出版人》杂志“书业年度评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奖励的是在某一年度做出重量级产品,以一己之力推动行业前进的优秀编辑。在《出版人》杂志记者杨帆看来,获得“年度编辑”女性从业者的比重确实在增加。自2019年起,评选每年授出10位“年度编辑”荣誉,2019年、2020年获得该荣誉的女性从业者分别为7人和6人,充分体现了“她力量”于出版行业的不可或缺。

女性从业者一直是出版业的重要支柱。从从业者的人数来看,在全国所有编辑中,女性占据绝对优势。但由于历史原因,出版业仍习惯男性视角的叙事,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在最近五年间,全球出版行业凸显女性趋势:越来越多女性出版人走上台前,为长期被出版业忽略的女性读者需求发声。这一趋势也体现在我国的出版业态中,一系列从女性视角出发、反应女性困境的虚构、纪实作品在内地出版,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出版商开始打出“女性主义三部曲”等营销口号,证明女性题材着实成为近两年的市场热点。

而在产品背后,女性出版人也正在经历“最好的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优秀的女性出版人成为图书品牌的主编或王牌编辑,涉及众多门类,做出了风格多样的作品。

过去人们常把编辑视为“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行业,以“板凳一坐十年冷”而自矜。诚然今天仍然有许多编辑兢兢业业于案头的工作,力图把最好的文字带给读者,但信息时代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编辑可以出现在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体介质中,与读者进行更紧密地互动。而女性编辑明显更精准地把握了这一时代脉动,她们在亲和力和等方面的优点正在被这个流量时代进一步放大。



对于动物园,现代人早已习以为常。但很少有人想到,动物园的公共空间属性其实来之不易,它在中国的发展,本质上是民众权利的争取过程。《洋镜头:1909,北京动物园》一书是中国最早的动物园——北京动物园百年前的写真。这本书由《京师博览园》和《农事试验场全景》两本相册及附录组成,展现了当年有识之士“与世界接轨”的观念。

叶克飞

说起动物园,现代人早已习以为常,默认它是城市公共设施的一部分,也是老少皆宜的合家欢选项之一。很少有人想到,动物园的公共空间属性其实来之不易,它在中国的发展,本质上是民众权利的争取过程。

动物园在中国艰难起步

1792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问中国。随团成员斯当东在《英使觐见乾隆》中记载,中国城市非常拥挤,市民没有可供娱乐和运动的公共用地。皇帝有御花园,大臣有私家园林,但民众无法进入。他认为,中国城市不是真正的城市,只不过是“把大量村舍与豪宅简单地堆到一起”。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对公共空间的吝啬源远流长。早在秦汉时代,皇帝的上林苑就严禁百姓进入。直至清末,李鸿章擅游荒废已久的圆明园故址,也被御史告发,罚俸一年。

西方则大大不同,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公共设施理念就已非常超前,古罗马贵族还有捐赠私家园林供市民游览的习惯。到了近代,西方大量官苑彻底向公众开放,可算是城市公园的雏形。工业革命后,经济飞速发展,大众也开始要求更多的公共空间,公园体系逐渐形成。1843年,利物浦动用税收建造了公众可免费使用的伯肯海德公园,标志着第一个城市公园正式诞生。

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就认识到了公园的重要性。相比之下,晚清官员虽然也很喜欢西式公园景观,但最初多是用来装点自己的私家园林。虽有开明派如端方,但终究是极少数。

至于比公园“技术含量”更高的动物园,在中国的起步同样艰难。动物园有着非常特殊的属性和技术操作难度,决定了它在世界各国的起步都由官方开始,中国也不例外。

新近出版的《洋镜头:1909,北京动物园》(广东旅游出版社2020年10月版)一书,便是中国最早的动物园——北京动物园百年前的写真。这本书由《京师博览园》和《农事试验场全景》两本相册及附录组成,展现了当年有识之士“与世界接轨”的观念。

其中,《京师博览园》相册初版于1910年,共收录64张照片,呈现百余年前北京动物园的历史风貌。《农事试验场全景》相册初版于1909年,共收录108张照片,呈现农事试验场开放之初的盛况。附录部分包含《京师博览园游记》一文和30余张照片,该文连载于1908年的《顺天时报》,是一份详细的“游园指南”,极具史料价值。

动物园的知识普及和公共空间属性

话说1905年,满清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考察归来的端方与戴鸿慈上折奏陈欧美各国“导民善法”,其中建议设立万牲园。万牲园的建设,被清廷纳入农事试验场的体系之内。1906年4月15日,清朝农工商部旨开办农事试验场,试验场是在原乐善园、继园和广善寺、惠安寺旧址上所建,初衷是为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开通风气,振兴农业”。

为了兴办万牲园,端方还从德国购置一批动物,包括一头大象、两头狮子、三只老虎和四只熊,成为后来筹办万牲园的基础。除此以外,清政府还令各地上供特产动物,慈禧太后亲自“拟选取各种鸟兽鳞介品类、先行奏养陈列,为动、植物院之基础”,还贡献了自己宠爱的小猴子。

同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万牲园也成为代表新气象的举措之一。1907年7月19日,万牲园正式开放,内设动物园、植物园、蚕桑馆和博物馆,展览动物约八十余种,共七百只,还设有茶馆、餐厅和照相馆等。

这个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动物园,让各种动物不再是御花园里豢养的皇室特供,成为面向大众的展品,加之动物来自世界各国,对时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立刻引发轰动。

1908年6月16日,农事试验场全部竣工,正式售票对外开放,门票售价为铜元八枚,孩童、艰役减半。如此一来,游人既可以参观奇珍异兽,又可在植物园欣赏花草树木。也因为万牲园太过吸引人,在时人眼中已超越动物园的范畴,成为京城公园的代表,所以逐渐代指整个农事试验场,是为北京动物园前身。

当时的《顺天时报》就盛赞“京师博览园在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内,博大富丽,包罗万象,为北京三百年来、中华二十一所没有见过的。一天游不完,需要分几天来游;一人记不清,需要分几人来记。”

万牲园的诞生并不容易,或者说,现代意义上之动物园的诞生并不容易。它不仅仅如前文所述,关乎公共空间的建设,也与人类对动物的态度有关。

《诗经》记载,周文王曾兴建灵台、灵沼,自然放养各种鸟兽鱼虫,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人工兴建的自然动物园。秦汉之后,帝王多在种植花木的苑囿中放养或设笼舍圈养动物,以供玩赏。

西方早期的情况也类似。这种情况直到18世纪才有所改变,因为贵族们的权力逐渐丧失,新兴资产阶级崛起,使得动物收藏逐渐大众化。19世纪初,经济发展带动城市扩张,人们开始建设公园,同时因为博物学的兴起,对动植物有着更深入的了解需求。

1828年,伦敦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家现代动物园——摄政动物园,其宗旨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研究这些动物以便更好地了解它们在野外的相关物种”。清廷设立万牲园,出发点与之一致,也是与世界接轨的证明。

更重要的是动物园的公共属性,所谓“公园”,就是“公共花园”。这种公共空间的理念,革新了人们对动物园的建设思路。端方作为满清难得具备时代眼光的大臣,就将动物园的“园”置于“动物”之上,其背后是权力对民众作出的让渡,即将旧时的特权享乐,开放为寻常百姓也可进入的公共空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也是我们如今得以畅游动物园的起点。

——评《洋镜头:1909,北京动物园》

动物园的诞生,是掌权者对民众的权利让渡